

摘要

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上海陷於戰火之中，在這特殊的時代背景下文學敘事方式必然發生重大的變化，敘事方式的變化是根據整個文化的變化而生。自五四運動以後，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，傳統的個人與社會倫理也重新被核定。中國長久以來一直奉行儒家的道統也經受了強烈的考驗，由於儒家的倫理有著“入世”與“致用”的“經世”策略和“實用理性”特徵，儒學的倫理觀便能長久獲得國家政治化的文化特權。¹

但自五四運動後，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受到西方思想個人主義的衝擊，加上由農業社會轉變成為當時上海以金錢掛帥的商業社會，一切家庭倫理關係，個體與人際的情感也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而被沖刷得乾乾淨淨，若然找回這種以人爲本位的倫理觀，必須以人類的日常生活的行爲中體現人類的道德倫理行爲。文學敘事便可以肩負重任把道德倫理載入人情世界裏，形成倫理——敘事的一種跨學科的研究。

蘇青正在上海淪陷時期發展她的寫作生涯，她爲自己以及所生活的城市尋找精神和心理依存。蘇青成功地把人生最實際的日常生存轉化爲文學敘事，以個體的生存經驗轉達她的倫理價值觀。

¹ 《聆聽那遙遠的倫理敘事》——序龔剛《儒家倫理與現代敘事》，台灣文史哲學出版社，2008年1月 p3。